

《西迁之歌》评述

锡伯族 赵志强 吴元丰

《西迁之歌》是一首叙述长诗(以下简称《歌》),在新疆锡伯族中广为流传,争相咏唱。它以细腻的笔墨,描绘了锡伯族西迁及移驻伊犁以后将及二百年的历史画卷,文辞优美,内涵丰富。

《歌》的原文是锡伯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传播。数年前,经锡伯族学者余吐肯译成汉文,使它飞渡伊犁河,走向全国,并于1981年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

一、作者、版本及名称

(一)作者。《歌》的作者是锡伯族诗人关兴才。

关兴才^①(1894年——1963年),本姓卦尔佳氏,讳兴才,字禎器,伊犁锡伯营正红旗(今察布查尔县四牛录)人。幼时聪颖过人,博闻强记,有神童之称。因家境贫寒,求学无路,凭超人毅力自学成才,学识渊博。解放前后,虽任过笔帖式、秘书等职,但颠沛流离,一生坎坷。晚年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翻译汉文文学作品,成就显著。

《歌》是作者自1948年至1961年陆续创作,日臻完善的。1948年4月18日(农历),即锡伯族西迁184周年纪念日,四牛录组织秧歌剧队,小学生们也参加演出文艺节目。当时,关兴才作《歌》的前数十节,配以锡伯民歌曲调,亲自教练。演出结果,大获成功。诗人倍受鼓舞,遂潜心研究锡伯族西迁历史,奋笔耕耘,终于60年代初完成整个诗作。

需要说明的是,在诗人创作《歌》以前,似乎已有关于锡伯族西迁的传说、歌谣流传于民间,成为诗人创作《歌》的基础。善保先生指出,“《徙迁之歌》(即指《西迁之歌》)这首歌,向已广泛流传于锡伯族民间。解放后,锡伯族民间诗人——关兴才贤老,以此所传之《歌》为据,加以整理,使之完善”。^②余吐肯先生说,“他总结和整理锡伯族西迁后流传的民谣,考证西迁路线”,而作此歌。^③忠录先生也说,这是一部在民间原有的多种《迁徙之歌》的基础上,由锡伯民间诗人关兴才于1959年再创作的史诗”。^④因此,确切地说,《歌》是关兴才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本民族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加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再创作的叙事长诗。

(二)版本。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歌》创作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未能正式刊行,只是在民间辗转手抄,流传下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传咏的《歌》彼此不尽相同。这也是民间文学变异性的具体体现。笔者未曾目睹关兴才创作《歌》的手稿,就目前的几种流传、刊行本而言,非但个别词句彼此不同,某些节段或有或无,甚至整个作品的长短也不一致。

1980年,笔者在察布查尔县二牛录搜集到民间传唱的《歌》,共100节,应为400行。但有二处明显各缺二行,一处缺三行,共缺七行,实有393行。从诗行和内容上看,显然尾残不全。

1981年,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语言学会油印发行的第一期《锡伯史资料汇编》所刊之《歌》,共127节,应508行,然有一处似缺二行,实为506行。

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徙迁之歌》一书所刊之《歌》,仅有54节,共216行。

以上三种,权作三种版本研究。80年本叙事止于解放初期(后残)。1981年本虽止于解放初期,但关于解放后的内容,系1980年本所缺。1982年本刊止于锡伯族迁到伊犁。相比之下,1981年本最长、最全,故本文以1981年本为主评述,1980年本、1982年本仅作参考,酌情采用。

三种版本的不同之处,详见附录,兹举数例以资说明(为了清楚起见,三种版本及其节、行,代之以英文大写字母A、B、C和阿拉伯数字。A为1981年本,B为1982年本,C为1980年本。字母后面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节数,第二个数字表示节内行数。如A1、1表示1981年本第一节第一行,余同此)。

例一:A1、1 亚洲西北。

B1、1 中国的西北。

C1、1 同A。

上例中,A、C同,而B异。另外,“西”字A、C用wargi,B用dergi。在满语和以往锡伯语书面语中,wargi表示“西”,dergi表示“东”。而在锡伯语书面语中,则反之,wargi表示“东”,dergi表示“西”,(其实满语中也有以dergi为西者),无独有偶,同样的情况在后面也发生了。如“带上故乡的南瓜,种在西天”一句,A20、4与C12、4“西”字用wargi,而B22、4则用dergi。显然,原作应为wargi,用书面语,B本刊行时,按口语习惯改为dergi了。

又,“亚洲”一词,用Aziya,系外来语。B本改为“中国”(汉语音译借词),亦属临时改动。

例二:A48、3: 已过赛里木湖。

B50、3: 行虽误期。

C40、3: 同B。

从例二改动句子上看,或出自作者之手,或系A本刊行时所改,均未可知。但从韵律的角度来看,改动后的句子不合音韵,似不可取。

例三:A34为:左顾右瞻,见彼苦菜。

欣然采之,相与饱食;

A35为:干渴以行,抵彼杭爱。

炎热难忍,停止湍行。

与A34、A35同一内容的二节,在B、C本中,除某此词语不同外,两节的前后顺序与A本也不同,即如按B、C本,则A35在前,A34在其后。

(三)名称。这首诗歌的名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西迁之歌》、《锡伯族迁来之歌》、《徙迁之歌》、《锡伯族自原籍迁来之歌》、《锡伯族今昔》、《故乡之歌》等不同名称。虽大同小异,亦属紊乱。据称,1948年“他(即关老——引者注)初草《西迁之歌》的前四五十段后,配上锡伯民歌曲调,亲自教唱排练,在‘西迁节’那天登台演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于是这首诗作很快在八个牛录流传起来。诗人见到初草的成功,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他更加振奋,考征西迁历

史,研究迁徙路线,不断修改补充,在五十年代末完成了整个作品”。⑤考《歌》的内容,前五十余节(如B本)尽写锡伯族自盛京西迁至伊犁事件。以此论文,该诗初草之时,当名为《锡伯族自原籍迁来之歌》,或简称《徙迁之歌》等。其后,虽经修改补充,内容增多,超出了“迁徙”范围,但考虑到初草成功后广为流传,故未更动名称,亦未可知。无论如何,锡伯族西迁是件大事,以此命名,即醒目且有意义。因此,本文亦取《西迁之歌》名。

二、丰富的内容、高度的思想性

《歌》叙述了锡伯族自辽宁移驻新疆伊犁,以及迁到伊犁后的历史,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按其叙述内容,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1至56节,叙述锡伯族西迁伊犁的原因、经过,迁到伊犁之后的编旗情况,以及锡伯族积极行动,准备迎接新的生活。在这部分里,作者对锡伯族同胞的生离死别,对西迁锡伯族的途中艰辛,表现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同时,也反映了锡伯族人民为了祖国边疆的安宁,不屈不挠,克服重重困难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如:

姑夫、姑姑来送行,共聚而泣。计无脱免,姑侄相离。
舅舅、舅母来送行,依恋以泣。计无辞留,舅甥相离。
亲友来送行,痛心以泣。守边伊犁,亲友相离。……
赴彼坟地,潸然恸泣。从此永别,孰将归祭?
留此荒坟,焚纸是谁?举家而行,添土是谁?

以上写西迁伊犁的锡伯族,辞别亲友,抛下祖先的遗骨,将要前往遥远的西陲,守卫疆土。生离死别,恋恋不舍,阅之催人泪下。

木车驾马,逶迤而行。高低莫辨,喝以德尔、浩。……
妇女分娩,裹布何在?无可奈何草裹以行。……
果子险沟,环流湍急。车行无路,坐视无计。
毅然商定,当即动手,细谷架桥,七十有二。
众志成城,厥出细谷。七月十九,终抵伊犁。

以上写锡伯族辞别故乡的亲友,在迢迢迁移途中,战胜险恶困苦,最终达到伊犁,完成了西迁的壮举。

第二部分,自57至77节,叙述锡伯族迁到伊犁后,开垦屯田,兴修水利,开创新生活的情形。在这部分里,既有人与自然的斗争,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同时塑造了锡伯族的水利专家图伯物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他的功绩,誉之为“水神”。

百年不迁,可不种植?百般思虑,不得耕地。
军民奋勉,锹锄属己。拓渠辟合尔,特为生计。
生息此地,渐觉不敷。得彼泉眼,移至东岸。

从此耕植，丰衣足食。三十七年，益加繁衍。

以上写锡伯族迁到伊犁之初，拓展原有的绰合尔渠引水耕垦，以及向东搬迁引泉水耕种，丰衣足食的劳动生活，描绘了锡伯族人民以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景。

时过三十七年，人口增多，耕作规模较前扩大，因而灌溉紧张，如同杯水车薪，锡伯族的生存蒙上了阴影。正当此时，锡伯族中涌现出一位忧民所忧、急民所急的杰出人物——图伯特。他为了民族的兴盛，力主挖掘察布查尔渠，并克服重重困难，率领锡伯族人民，用了七年的时间，挖成长二百里的水渠，辟田八万亩，为锡伯族的生存开辟了新的道路。因而，在这个部分的最后，作者写道：

耕以此渠，丰衣足食。迄今已逾，百五十年。

在开凿察布查尔渠时，广大锡伯族人民不仅战天斗地，与自然界作斗争，同时还和本民族内部的反对势力斗争。

图公忧心，谋为万民。倡凿利渠，察布查尔。
商议之始，聚四牛录。开凿之初，派人四百。
愚者固执，缪违众议。如至不能，枉费力气。
莫大喇嘛，知之竟坚。如至不能，本族是抵。
私议被否，愿从众议。削察布查尔山峰，特作渠口。

由上可见，图伯特倡导挖渠，得到了广大锡伯族人民的支持，莫大喇嘛即是其一。正是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一条新渠终于修成了。如今，察布查尔渠仍是该县的重要灌溉渠道之一。

第三部分，78至107节，诉说西迁锡伯族在有清一代、苏勒坦汗统治时期、沙俄侵占伊犁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

自来伊犁，差使极繁。自备乘骑，皆是其嫌。
喀塔换防，蒙受百难。遭遇险恶，亡不撤换。
台站当差，无奈忍之。量发盐菜银，何足果腹。
百难而忧愁，何暇种植。妻子饥寒，万难是受。

以上写的是清代。锡伯官兵戍守卡伦、驿站，赴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清政府只发给一些盐菜银，除此之外，一切自理，就连当差乘骑的马匹也都自备。丁壮应差在外，无暇耕地，妻儿在家饥寒交迫。

炕不铺席，度过七载。当伯克之差，生计是失。
多难锡伯，菜饭是食。迫于饥馑，曾食糖秕。
赤裸无奈，制衣以袋。时属极寒，裹身以毡。

以上写苏勒坦汗统治时期,锡伯族人民的艰苦生活,差使繁重,失去生计,缺衣断粮,情殊可悯。

岁在辛未,沙皇占伊犁。劫后锡伯,终未免灾祸。

田不能耕,衣食不济。稍养蚕豕,不足纳税。

以上写沙俄侵占伊犁之后,大肆搜刮,使得劫后余生的锡伯人民,呻吟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第四部分,自108至127节,歌唱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锡伯族人民翻身解放,获得新生。

在这部分中,作者热情地歌颂了新中国诞生,并歌唱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携手共进,同时也号召锡伯族人民团结起来,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建设祖国的西北边疆,创造美好的明天。

众皆一家,同为兄弟。愿靠共产党,以安其心。

各坚其志,诚心依靠毛主席。毋图安逸,投身于一切建设。

在这里,作者的呼声代表了锡伯族人民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同心协力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

纵观以上四部分所反映的内容,一环紧扣一环,最终阐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锡伯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就不能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真理。这也是《歌》所要反映的中心思想。

三、完善的形式、精湛的艺术性

在文学创作中,完美的、适合于内容的形式有利于作品内容的充分表现,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歌》的内容如前所述,是丰富的。为了充分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便于咏唱,增强其艺术感染力,《歌》采用了诗体,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谐。

(一)体裁。《歌》为诗歌体,共127组,每组四行,如同汉族诗歌的绝句。如:

亚洲西北,伊犁一隅。民族独立之时,人道是乌孙之国。

《歌》的全部内容,都是通过这样四行一组的诗歌体表现的。

作为诗歌,《歌》在音韵方面也很有讲究,基本符合锡伯族诗歌的押韵特点。一般来讲,锡伯族的诗歌多为四行,要求一至四行押首韵,同时一、二、四行押尾韵。锡伯族属粘着语,因而在诗歌押韵方面,首韵用同一元音或辅音,尾韵用同一类型词尾形式或同一字母。如(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将原文转写成罗马字母,下同):

goro jecen be feshelhe,
güidame elhe be bodoho,
gūsai irgen tebunere be,
gülmin arga obuha.

上例一组诗中,一至四行首韵押辅音“g”音,一、二、四行尾韵押以“he”、“ho”、“ha”音,均属动词过去式词尾形式,押韵整齐。

不过,一百余组五百余行诗,都做到押韵整齐是很困难的。因此,《歌》的作者在这方面也不拘一格,没有被押韵束缚手脚而影响内容的表达,这也符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

siren mama be gaisu,
sirame juse fusembi,
harkan mafa be gaisu,
horhon ulha fusembi.

此组中,首韵一、二行押“S”音,三、四行押“H”音,尾韵二、四行押“mbi”音(原动词词尾),读之亦朗朗上口。

总的来说,多属押韵,较为齐整。尤其是一、二和三、四句分别押首韵,二、四句押尾韵的形式,更显得灵活、清新。至于首尾俱不押韵者,是属一大遗憾,所幸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二)结构。《歌》的总体结构是编年式结构,按历史发展的线索,写了锡伯族的西迁及西迁到伊犁以后的情况。就其每一部分的内容而言,情节的安排和组织同样是编年式。如第一部分写西迁的原因、经过以及到达后的编旗情况,第二部分写疏通绰合尔渠,开垦屯田及挖掘察布查尔渠的情形。第三部分写不同时期的苦难状况,第四部分写翻身解放,迎来了新的幸福生活等。这样编年结构最大优点,在于线条清晰,便于记忆,同时也有洒洒洋洋,一泻千里之势,把百余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从头到尾一气吐出,淋漓痛快。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往往交织在一起,并不如梳如篦,排列齐整。表现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采用绝对的编年结构是不可想象的。《歌》也不例外。从内容上看,《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并列的,只为叙述的方便,先写了锡伯族迁到伊犁后兴修水利务农为生的一百五十余年,而后回过头来再写此间的艰苦与不幸遭遇,这样,使《歌》多少有点跌宕起伏,绝不象编年体史料长编,同时叙事清晰,脉络分明,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歌》在叙事的结构中,融进了抒情的成分,从而避免了叙事的平淡乏味,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说,诗人满怀激情叙述了锡伯族的西迁以及到达后的斗争生活,抒发了自己丰富的感情,使作品达到娓娓动听、感人至深的艺术境界。

《歌》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叙述,另一方面又饱含着诗人丰富的感情,有较多的抒情成分。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歌》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成分,是一首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的诗作。

(三)语言。《歌》的语言通俗而又凝练,新鲜多样且富有音乐性。《歌》虽为叙事体,但在平铺直述当中,也不乏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叙述锡伯族的西迁,有这样的描写:

木车驾马,逶迤而行。高低莫辨,喝以德尔、浩。

读了这段诗,当年锡伯族在西迁途中,坐在木车上,吆喝牲畜,在凹凸不平的原野上艰难进行的情景便浮现在眼前,如临其境。诗中“逶迤”(mosikūng tosikūng)一词非常形象、传神。

管带部众阿木呼郎，威严若雄狮。
不等天明，扰人如黄鼠狼。

阿木呼郎是清政府选派的管带锡伯人迁移的官员之一。锡伯族以狮比喻大要淫威之人，以黄鼠狼比喻吵闹扰人之人。诗人以简练的语言，以锡伯族的语言习惯，活脱勾勒出阿木呼郎淫威可怖、令人厌烦的面目，既形象又生动。

《歌》仅以五百余行诗句，高度概括了锡伯族西迁及在伊犁活动的将近二百年的历史，这充分说明其语言何等凝练，可以说，《歌》的每节每行，都能体现这一特点。

《歌》中并没有堆砌华丽的词藻，语句结构也很有限，通篇都是大众化的言语。但咏吟之余，使人感到清新自然、灵活多变。譬如描述锡伯族青年挖察布查尔渠，就用了“实力以掘”、“掘以同心”、“濬掘”、“不停不误地挖”、“不间不断地挖”等各种不同的写法，语言灵活多变，读之颇觉清新。

《歌》的语言新鲜多样，还表现在，根据需要选用了不少借词，效果良好。例如，沙俄侵占伊犁后盘剥锡伯族人民，诗中写道：“虽然养了一些猪，不敷交纳伊色勒”。伊色勒(isel)显系俄语，意为贡献。若用锡伯族“阿勒班”(alban, 赋)或“齐芬”(cifun, 税)，亦无不可，但不如“伊色勒”生动。又如，“盐菜银”一词，既用了锡伯语“dasun sogi menggun”，又用了“盐菜银”汉语音译。

《歌》的语言富有音乐性，也是其一大特点。据称，作者写出《歌》的前数十段后，曾配以锡伯族的民间曲调，教人吟唱。可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就注意了音乐美感。《歌》除其押韵之外，每句用词也有讲究，虽词之多寡不一，或三、四，或七、八，但如果按锡伯语口语吟诵，则在听觉上有明显的节奏，每句一般为七、八个音节。由于音韵和谐，节奏鲜明，读之若行云流水，听之若音乐贯耳，具有听觉上的美感。

四、《歌》的历史认识价值

《歌》的内容，如前所述，写的是锡伯族的西迁及迁到伊犁后的实际生活。因此，有人称之为“史诗”，这是当之无愧的。据粗略统计，《歌》中出现的地名、河渠名三十有余，如伊犁、乌里雅苏台等等；提到人名十余人，如达瓦齐、班第等等；历史事件近十个，如平定准噶尔、沙俄侵占伊犁等等；对锡伯族的生产、生活习俗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现，生产如劳动工具名称、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情形等，生活习俗如称谓、丧葬、婚姻、祭祀等。凡此种种，对广义的锡伯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对于锡伯族的西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歌》作了客观、正确的描述。诗人以三段十二行文字简述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写道：

开拓远疆，计长久之安。
称驻旗民，为久远之策。

满洲皇帝之谕，降于盛京将军。
拣选一千锡伯，命其移驻伊犁。

这二段内容,与史实相符。据史料记载,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北疆准噶尔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南疆维吾尔大小和卓木叛乱之后,设立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并调遣满洲、索伦、达斡尔、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及绿营官兵到新疆驻守,以固防务。当时所调锡伯官兵,是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选派的,并且携眷移至伊犁河南,驻防屯田。^⑥这也就是《歌》第一部分所反映的内容。

有一种意见认为,锡伯族之所以西迁,是清政府对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的确,清统治者曾对锡伯族采取过“分而治之”的政策,如康熙中期,清政府将齐齐哈尔等地的锡伯族,移至盛京、京师等处,分至满、蒙八旗,即是一例。^⑦但锡伯族的西迁,则迥然不同,其证主要有三:一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确实出于新疆防务之需要。二是,同时迁移的除锡伯之外,还有索伦、达斡尔、察哈尔、厄鲁特以及绿营,尤其还有满洲。如果对锡伯是分而治之,那么对满洲是否也是如此,显然不在情理之中。三是,锡伯族移驻伊犁后,单独编为一昂吉(营),与满洲、索伦(包括达斡尔)、察哈尔、厄鲁特昂吉并立,成为驻防伊犁的五支劲旅之一,且终清之世,相沿不废。这一点也说明,清政府对西迁锡伯族何等信任、何等重视。若斥为“分而治之”,恐说不通。

由上可知,《歌》所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正确的。尽管诗人对锡伯族西迁之际的生离死别,对西迁途中的艰难困苦,描述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这也是人之常情,事所难免),但在如何看待西迁的问题上,其着眼点是很高的,自觉地从历史的高度,将锡伯族的西迁置于当时的特定环境中,加以认识,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二)对锡伯族迁到伊犁后兴修水利、开垦屯田的事迹,描写得较为详细。

锡伯族移驻伊犁河南岸,疏浚了旧有的绰合尔渠,引水垦种。从此,绰合尔渠便称为“锡伯营渠”或“锡伯旧渠”(这显然是后来的提法,相对于察布查尔渠而言)。但绰合尔渠流域,并不是理想的耕作之区,正如徐松所说:“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地阻岸,虑在无水”。^⑧锡伯族在此耕种一段时间后,便觉得耕地不足,于是东移,引泉水以耕。从此丰衣足食,历三十有七载。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垦规模的扩大,泉水亦显不敷。于是,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当机立断,倡议开凿新渠于绰合尔之南,引伊犁河水灌田。在广大锡伯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挖成东西长二百余里的水渠,如前所述。

新开凿的水渠,在清代称之为“锡伯八旗渠”,又名“锡伯新渠”(显然相对于绰合尔渠而言),亦即今天的察布查尔大渠。新渠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开创了锡伯族社会生活的新纪元,并福延后世。正如《歌》中所述:

新开渠名,察布查尔。仓满廩盈,特为生业。

八万亩田,分至八旗。闸口定制,奕世为业。

二百里渠,为子孙之安定。造福万世,实义臣之恩威。

有关锡伯族兴修水利的记载,在古籍文献中很少见到,尤其开凿察布查尔渠的情况,除了《西域水道记》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比《歌》更详尽的描述。因此,在这方面,《歌》的内容弥足珍贵。

新渠的开成,在西北边疆的农业开发方面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对此,清人徐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既濬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⑨郑指郑国

渠,白指白公渠,郑白二渠都是古代关中平原有名的人工灌溉渠道。徐松以察布查尔渠比于郑白二渠,并说“郑白之沃不足云也”,可见察布查尔渠在当时边疆农业开发方面,其地位何等重要,其影响又何等巨大。察布查尔渠的修成,也充分体现了锡伯族人民在农田水利工程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

(三)有助于认识锡伯族的苦难历史。《歌》尽情诉说了锡伯族移驻伊犁起,直至解放以前遭受的种种苦,既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也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造成的困苦,以及外国侵略者的欺凌践踏;既有军阀官吏的讹诈暴行,也有土豪劣绅的搜刮剥削等等。所有这些,在史料中凤毛麟角,远不能反映全貌。因此,《歌》的内容弥足珍贵,既可补史料之缺载,又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锡伯族的过去。

(四)正确地叙述了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锡伯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这样一个客观真理。锡伯族移驻伊犁后,百余年间,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外国侵略者的践踏,苦不堪言,是谁拯救了人民?

伊犁边陲,民生如此艰难。人口减少,全是这一弊端。

如此穷威,救我谁为先?厥心之安,盖有毛主席。……

逐国民党,解放全国。清除恶霸,施行仁政。

综上所述,《歌》内容丰富,形式完美,是一部高度思想性与精湛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叙事长诗。《歌》在锡伯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也属于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注释:

- ① 按锡伯旧俗,姓名不连,称名不道姓。后因汉文化之影响,始从其俗,多冠姓于名前,姓名连称。取汉字为姓之法,则依本姓第一音节之音,酌取谐音汉字。卦尔佳氏之“卦尔”(guwar)虽系两音节,即 gu 与 war,然在口语中,须一气呵成,音念“卦尔”,与“关”近。故卦尔佳氏多取“关”、“管”为姓。兴才老人之汉字姓,目前从有关文章来看,或作“关”,或作“管”,用字不一。按常理,二者必居其一。一般而言,关字居多,故本文依此。
- ② 善保:《徙迁之歌》“引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原文系锡伯文,引者译为汉文。
- ③⑤ 余吐肯:《锡伯族诗人管兴才与〈西迁之歌〉》。见《满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页。
- ④ 志豪:《锡伯族文学概况》。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编《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第126页。
- ⑥ 详见拙著:《锡伯族西迁概述》,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 ⑦ 详见拙著:《锡伯族南迁概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 ⑧⑨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4,第18页。
- ⑩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汉文朱批奏折“民族类维吾尔族项”第166卷。

责任编辑 关纪新